



鸮与龙

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

[日] 蔡林海 著
李旭光 等译

青島出版社

鹰与龙

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

[日] 蔡林海 著
李旭光 等译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鹭与龙: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日)蔡林海著;李旭光等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ISBN 7-5436-2737-X

I. 鹭... II. ①蔡...②李... III. 知识分子—概况—中国②华人
—知识分子—概况—世界 IV. D663.5②D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078 号

该书日文版由日本经济评论社出版。

- | | |
|------|-------------------------------------|
| 书 名 | 鹭与龙: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 |
| 著 者 | (日)蔡林海 |
| 译 者 | 李旭光等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
| 邮购电话 |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5840228 |
| 责任编辑 | 郭东明 王东华 |
| 装帧设计 | 申 尧 |
| 印 刷 | 青岛胶南印刷厂 |
| 出版日期 |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850×1168 毫米) |
| 印 张 | 8.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20 千字 |
| ISBN | 7-5436-2737-X |
| 定 价 | 15.00 元 |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缺页、散页、错装、倒装、字迹模糊等,
请寄回承印厂调换。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作者简介

蔡林海,男,1957年出生,1979年进入中国上海广播电视技术研究所工作。1989年赴日本留学,在筑波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产业经济社会学,专攻跨国公司经营论。1995年博士课程修了并取得产业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日本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工作,任亚洲商业研究部负责人、主任研究员。2002年3月调至日立集团海外事业本部。现任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经营战略室室长兼事业开发部副部长及日立综合计划研究所特别研究员。

同时兼任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特别研究员、青岛大学客座教授及上海市海外联谊会海外名誉理事。

已出版《金融危机和亚洲经济的新局面》、《挑战亚洲危机的华人网络》、《市场与文明的角逐》等著作,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有关跨国公司经营管理、华人经营等论文数十篇。

序 言

此文仅为序言，既非对蔡林海博士本书之论述主要内容的介绍，也非其总结。蔡林海博士把使人在阅读中不觉自正其身，且能以虚心坦荡之胸怀正视日本在今日世界之现状的、极具冲击力的内容，连同丰富的佐证资料，在题为《鹭与龙：跨国公司战略与华人创新网络》的著作中一并奉献给读者。对此宏篇巨制做一总结，远非力薄如我者所能胜任。

但我一直给予关注的许多议题，都确切地包含在蔡林海博士论述严谨的大作中。蔡博士以中国国籍在日本筑波大学获得产业社会博士学位，以“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桥梁”自期，厚积薄发而成新锐，我虽勉强执笔为序，但不免准备在内容上引用蔡博士所论来展开自己的论点，尚望宽宥。

今日有必要进行结构改革者，非仅吾国日本。虽然在内容上有各种不同，结构改革的确已成 21 世纪各国共同政策课题。当然我们应当看到，各国努力的程度还是有相当差别的。

毋庸赘言，中国乃是立足于长期视野、以不可模拟的规模、以蓬勃态势致力于国家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革的国家之一。虽明知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要这样讲。以中国悠久历史及传统为背景的新一代中国人的精英，正作为 21 世纪世界结构改革的旗手而崭露

头角。他们与欧美敏锐的智能携手，应会成为“知识纽带”这一结构的主力，以及改变世界的动力。这就是今日之现实。

讨论政治问题非本书目的，但即使是仅限于经济话题，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就有几派。有的认为中国迅猛的发展速度是威胁，有的认为反正中国要来学习我国的先进技术，所以，即使保持沉默，中国也会伸手；有的认为，在中国会产生发达地区同落后地区的内部分裂；还有的认为，日本作为美中两国的缓冲地带而受到这两国的重视，因此不会出现对日本不利的环境。

我虽生在日本，但极幼小时即侨居中国东北地区，小学是在北京上的，遗憾的是汉语已遗忘殆尽。尽管如此，在踏上社会之后，因工作关系，我得以遍游中国。2002年初，机缘巧合，承蒙位于山东省青岛市的青岛大学授予我名誉教授称号，愈使我感到中国是我的半个祖国。上面罗列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几种看法，都是根据半个世纪以前旧一代中国人的印象得出的。以现在的中国观视之，难说中肯。何故？这是因为不少日本人的“中国观”还没有改变。相当数量日本人的中国观，至少还停留在近代史的水平上，认为中国人依然教育水平低，工资也低下，在拥挤的人口密度中生存。如此这般，却无人觉得应以这种一是无礼、二是充满谬误和偏见、三是无知的观点为羞。不仅是对中国，对那些与中国一样正走在发展路上，致力于提高其国民生活水平的各国也只有这种认识的话，那抱有此种认识的国家自身将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衰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们应摒弃对中国的各种充满谬误的印象。

在本书中，蔡林海博士用“华人”这一词汇来分析当代中国人的进取精神与成就。“华人”这一概念早已有之，但蔡博士所言华人无疑是指新一代华人。所谓新一代华人，指与有无中国国籍无

关但却以中国人自居的人,更是指这样一个巨大的人才集团:他们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高水平,而且他们在具备丰富创业机会的国度,吸收了更多的知识,在最先进的环境中从事着实际的工作;他们因拥有中国人之外的知己而以超越古老国境的连带感结为一体,并且被包括母国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当成珍贵的人才资源而加以善待。这个人才集团的成员数量正在急速增长着。

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些被称为华人的人们在知识产业领域、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活跃着。自那时起,我就常遇到断言“我应从事的是创新工作”的居住在美国的年轻中国人。最近我得以经常访问中国,通过与那些有识之士的交流以及对新城市建设现场、开发地区的考察,得知了下列新的事实:如今从国外归来的华人渐渐地在中国建起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他们把在硅谷从事实践工作时获得的经验及当时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加以活用,并且,中国政府对这些海外归来者也待为上宾。当然华人之中也有大量的人留在美国,继续在世界领先的美国企业里从事重要的工作,而美国政府也把这些华人人才当成美国的重要财产加以温暖关怀。现在美国的强势企业中,公开如此声言的越来越多:我们寻求的不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是想得到这样的人才资源——他们精通两国语言,有在美国企业里工作的经验,且拥有生来具备又得力于后天训练而更趋精密的头脑。此外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间的合作即产学研合作领域中,这些新一代华人尤其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人明显地活跃起来。我还发现在欧洲,虽为数不多,但学习各国语言的华人早就开始融入其社会,且接受国也深知华人人才之可贵而关怀有加。在欧洲各国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的华人越来越多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另外一个不能忘却的事实是：几乎遍及世界的华人投资网络组成风险投资群，对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地方活动的华人不遗余力地给予资金支持。当然这些不仅是中、美、欧之间的联系，而是华人活动的网络正在向全世界扩展。

我在中国遇到很多归国的留学生，他们不仅已经把汉语和英语均像母语一样运用，而且商业习惯也很大程度上欧美化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国际习惯。随着发展，将来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即把中国的习惯本身就当成国际习惯。

我一直坚信，不仅是在经济、金融领域，而且在包括政治、社会、教育等在内的所有领域，吾国日本都已到了应当推进结构改革的时候。但我也认为结构改革方法应因国而异。蔡林海博士在书中指出的方法是值得日本参考的。然而让我担心的是：在日本的数万米高空之上，以华人精英及其交流与网络为基础，超级大国之间知识的交流及网络正在形成，而我国连“正准备参加这样的网络”这样的话都没有出口。

令我颇为感慨的是，今日，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一天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出国、回国，疲惫至极的白领职员们的身影络绎不绝。如果在日本等待他们的仅有企业整编和裁员，只能说这是国家的损失。为何日本不把外国的经验向前更推一步呢？为何这些人只会对趾高气扬的上司唯唯诺诺呢？为何在日本的有能力的许多外国知识分子早早就做归国之计呢？

在此，我不过是我平时思考的事情罗列出来而已，而主角是蔡林海博士。我拜读了他的大作，受益匪浅。本书虽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大环境下，分析华人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及效

序言

果的专著,但对正探讨经济结构改革的日本而言,也是一本充满了宝贵启示而能在历史上流芳的著作。

原日本政府金融再生委员会委员

现日本政府金融厅顾问

日立制作所顾问

中国青岛大学名誉教授

矶部朝彦

2002 年元月

前言

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的挑战

今后 10 年,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将有可能从制造业扩展到知识集约型产业领域。跨国公司业对华投资正从“生产转移”阶段进入“研发转移”阶段。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崛起,不只是以“廉价人工费”为武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也缘于中国的创新,还有支撑中国创新的数千万的人才资源。而且硅谷的华人专家及其网络成为中国在全世界开拓知识的渠道。正在摸索“产业空洞化”解决之道的日本产业界在应对制造业及知识集约型产业方面同中国竞争的同时,也应从在全世界领域开拓知识的角度,思索同中国一起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这个时期已经到来。2002 年,中日两国政府及产业界在开发第二代互联网方面的携手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上述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制造”的真正价值

今后 50 年的亚洲经济势力版图将由从现在起 10 年间中国和日本协调或者竞争的结果而定。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正面临着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的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化”成为展望日本经济的几个要素之一。对日

本经济进行结构分析,可以理解由“产业空洞化”带来的对日本前途的强烈不安。经合组织(OECD)根据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了日本的产业竞争力,结果表明在日本,以电子机械和汽车为支柱的制造业的生产率很高,但服务行业的生产率低。日本经济结构是强大的出口型制造业支撑低效率的服务业等其他产业的结构。但是由于日本国内人工费、电力费、运输费和税金高等经营环境的不佳条件和生产、供应向中国的移转,日本的出口型企业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日本的贸易黑字连续3年减少。产业空洞化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可能会带来贸易黑字进一步缩小、贸易收支与经常收支变为赤字、国内经济规模越来越小等连锁反应。而且如果应对迟缓,日本经济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的崛起对正在摸索产业重振策略的日本产业界而言,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而且无视中国,日本企业就不能确立必将到来的经营战略的时代。丰田汽车公司的奥田董事长这样表达了危机感:“不考虑今后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日本就有可能被吞掉。”简言之,“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对日本未来的影响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要素。

一般都认为“人工费低廉”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崛起的主要原因。但是世界上人工费比中国更低的地方还有很多,因此难以单凭“低成本”来概括中国崛起的原因。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崛起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现在举出下列3点:

第一个原因是成本上的竞争力。看一下20年间亚洲地区的人均工资,与发达国家的日本、NIES的新加坡以及ASEAN的马来西亚相比,中国始终在非常低的水平上推移。而且在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人均月度人工费”方面,中国是131美元,仅仅是日本(3288美元)的1/25。以低廉的人工费为武器,中国在纤维纺织等

劳动集约型产业和机械等中端技术产业上不断提升着自己的成本竞争力。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分析一下东亚的机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话,日本的下降和中国的快速上升十分醒目。

第二个原因是生产和供应从世界向中国的移转。由于向巨大市场进军和利用低成本等目的,世界向中国的“产业大转移”正在进行。正在上海进行数十亿美元的大型投资的德国 BASF 公司的施特尔布总经理称:“在欧美的工厂正在逐渐关闭和缩减,但对华投资继续推行扩大路线。”日本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由纤维产业开始的生产对华转移在电机方面持续着,近几年,甚至波及到汽车和其他零部件产业。2001 年全世界的经济同时陷于不景气,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实施上却有 25% 以上的增长率。

也有人分析认为:“中国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有的只是低廉的人工费用。中国以此为武器吸引来外资,作为世界的生产据点成长起来。”其实这不过是无视中国显著技术进步的议论。中国的崛起绝不是只因为低廉的人工费用和外国直接投资。

在此特别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崛起的第三个原因。这就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日本社会经济生产性本部在 2001 年 11 月公布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报告中指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对劳动生产率予以国际比较,分析 1990 年到 1998 年这 9 年中 52 个国家或地区年均实质 GDP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年增长率平均值方面,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改善率是中国的 8.1%。

中国为了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了“国债资金技术改造事业(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特别资金实行企业技术创新的项目)”。该项目在过去 3 年间向 520 家国家重点企业和 120 家企业集团累计投入 265 亿元人民币技术创新资金。从 2001 年开始进一步投资 435 亿元人民币。此外,为了以产、官、学的形式发展制造业竞

争力,通过以全国 84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 6 所重点大学为中心的“国家技术转让中心”提高着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中国进而实施了“制造业信息化工程(通过引进信息技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工程)”,在科学技术部领导下,开展向全国 2000 家制造业重点企业引进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或 CIMS(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的样板项目。

国有企业自身也在强化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在中国正式加入 WTO 的 2001 年 12 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以全国 500 家大型国有企业经营者为对象,就如何应对入世后的全球竞争作了调查,前两位的回答是:加速人才的引进和培养(47%),增加研发投入。

由于技术的进步,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国,其 IT 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几乎达到 10%。日中贸易方面也是如此,从 2000 年起,“计算机及同类产品”和“办公机械零件”成为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剧增种类。

技术进步促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和日本竞争领域激增。在汽车和精密机械领域日本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还能不能保持 10 年,丰田汽车公司的奥田董事长对此深表担心。2001 年笔者在东京的一个以国有企业经营者访日团为对象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日本和中国竞争力比较》的演讲。在向 58 名参加人询问制造业方面日本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今后的变化预测时,七成人回答今后 10 年间日本和中国的技术优势将会逆转。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今后 10 年间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将从商品制造领域扩大到知识生产领域。

2. 知识经济和中国的新挑战

今后 10 年,展望中国经济,分析国家、地区间竞争优势的关键

是“知识经济”和“创新”。

2002年1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中国与知识经济:抓住21世纪》的报告。受中国政府委托于2001年10月完成的这份报告指出,21世纪全球大竞争的关键是知识经济,而知识经济之竞争取决于“人才资源”与“创新”的战略。据OECD的分析,知识经济的发展须具备下列4个要素:

- (1) 新知识的创造与现有知识应用所需的激励制度与环境
- (2) 新知识的创造与现有知识应用所需的人才
- (3) 动态的信息基础设施
- (4) 创新体系与在全世界开拓知识的能力

本书将根据上述4个要素构成研究华人创新网络与跨国公司战略的理论框架,从而探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本质及其客观条件。

3. 本书视角

正如IMF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20多年来推行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在这20多年间,中国抓住了亚太地区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两大历史性经济发展机遇,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在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1978至1997年),以日本为火车头的亚洲根据“雁型发展模式”推动工业化,其波及效果的影响甚广。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受惠于雁型发展模式与波及工业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奠定了今天的经济和产业基础。

其次,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规模的信息化带来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机遇。亚洲货币危机以后的1998年到2001年的3年间,中国经济乘信息革命之势进入跳跃式发展之状态。而且,从2001年

起,中国以“西部大开发”、“加入 WTO”、“信息化”为三大强劲引擎,继续谋求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

西部大开发通过地区开发和缩小贫富差距来唤醒国内基础设施市场和个人消费市场潜在的巨大的需求,引起内需扩大的效果,最大限度地激活“内在的”动因,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加入 WTO 之后,通过关税的下调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撤销,在毅然进行市场开放的同时,加快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 WTO 规则向国内各个领域的渗透,为应对经济全球化,需要改善体制,活用“外在的”动因,以创造有利于持续增长的环境。并且,信息化构筑了中国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坚实基础。在中国,所谓的信息化是指:(1) 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2) 以信息技术促进工业化的加速;(3)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这三方面内容构成的知识经济的发展进程。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方面,有“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校校通(全国 70 万所中小学校上网计划)”等国家级的信息化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是在为知识经济打基础方面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唤醒对信息化投资的巨大市场需求方面,也向那些在美国 IT 业不景气重压之下的高科技企业传递了明朗的信号。在“中国与数字时代的发展经济学”(第一章)中,描述了中国抓住信息革命的良好时机摸索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情况。

构成知识经济中心的是“创新”和“人力资源”。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不是指廉价而丰富的体力劳动力,而是指成为创新力量的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也就是所谓的“头脑”。“创新”和“人力资源”是引起中国经济产生质的变化的基本要素,也是本书的两个关键词。

如果把创新作为理解中国经济质的变化的一个关键词,有必

要首先阐明中国的创新及其实际状态。由于决定创新胜负的是人力资源,所以必须分析一下中国人力资源的构造。笔者从“现有人力资源”、“潜在人力资源”、“海外储备人才”三部分着手分析中国人力资源的构造。在这里,“现有人力资源”指现在正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活动的的人才;“潜在人力资源”指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就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海外储备人才”指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学业结束后在留学国就职、定居的人才。到2001年6月为止,中国的“海外储备人才”有32万人之多。这些人才学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尖端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的方法,拥有创新的能力。而且他们以美国的硅谷为中心集聚,形成“华人创新网络”,这一网络将成为中国创新的主力而发挥作用。

中国的创新和知识型华人网络这两者,都同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及其向中国的拓展紧密相连。因此,本书从“中国的创新”、“华人创新网络”、“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战略”这三个视角出发,考察、分析中国经济产业质的变化。

3.1 视角之一:中国的创新

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重视通过创新来达到经济发展的质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1986年3月,基于邓小平的号召而推进的“中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略称“863计划”)得以实施,中国以此为契机开始构筑创新体系。

中国的创新体系由“主导体系”和“辅助体系”两部分组成。其中的主导体系由“863计划”、“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计划(简称‘火炬计划’)”、“中国基础研究计划(简称‘973计划’)”三大支柱构成。而辅助体系则由技术服务、中介、技术成果等知识产权的交易,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实施,监督机关,创新基金和风险基金,“创业市场”等构成。在“头脑的回流与中国创新体系”(第四

章)中,通过大学科学技术园、留学生创业园等事例,详细考察了中国创新体系的全貌及在构筑此体系中拥有尖端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华人头脑所发挥的作用。

评价某国家或地区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人力资源。换言之,人力资源是左右国家间或地区间创新竞争的一大要素。此外,创新的竞争趋于激化,国家(或地区)间制定了各种政策工具,引发争夺人才的竞争,加速了人才的国际流动。另一方面,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政策工具的运用,“人才的回流”进程正在取代“人才流失”。在“新经济地理和华人高新技术共同体”(第五章)中,从“现有人力资源”、“潜在人力资源”、“海外储备人才”三部分着手对中国人力资源进行构造分析,而且具体考察了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北京的中关村科学技术园区这三大高科技共同体之间的中国人力资源的动态流动和华人资源融合的加速过程,以及根据这些“人的联系”而产生的创新能力的移转。

在中国,尽管创新体系的构筑尚未完成,但对创新投资的效果已经在产业发展和出口结构升级等领域有所反映。在“鹭与龙:美国的知识产权与中国的国际标准规格”(第七章)具体分析了中国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培育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在制定电子通信的国际标准规格领域与欧美并肩齐趋,创造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规格“TDSCDMA 方式”的历程。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从制造力到创新力”(第八章)中注意到了 IT 制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已取代纤维、玩具、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中国最大出口产品的事实。在考察被认为竞争最激烈的美国 IT 市场上“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显著上升的趨勢的同时,究明了其原因。